

邱椿著

古代教育思想詒叢

上册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G40-09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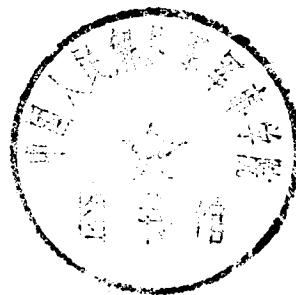
2 033 0644 9

古代教育思想论丛

上 册

邱 椿 著

6.12.1987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古代教育思想论丛

上 册

邱 椿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

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.875 字数：352千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000
统一书号：7243·258 定价：2.60元

出版说明

邱椿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，1966年逝世。这部遗稿是他解放后计划撰写的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》一书的一部分。

邱先生号大年，江西宁都人，1897年生。早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、柏林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，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先后任清华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及北京大学教育系系主任等职。

邱先生1951年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不久，即患病。在长期的病休中，他一直坚持研究和写作，并决心撰写一部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》，可惜这部书尚未完成，他即于1966年9月，在“四人帮”反革命路线的迫害下，不幸逝世。这十多年他虽在病中，仍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，写出朱熹、陆九渊、杨简、王阳明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颜元、李塨等九人的教育思想，共约八十万字，汇集了大量的思想资料。这次我们出版的邱椿教授遗著，都是经他本人修改定稿并亲自誊写的，本书拟分上、中、下三册出版。

邱先生一向治学严谨、刻苦，他曾说自己的研究方法不是“蜜蜂派”，而是“蚂蚁派”，较多注意的是搜集整理材料。其实，邱先生在解放前夕，即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，并力图以此指导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，有些分析虽不尽妥切，但他的治史精神和努力方向还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。

目 录

朱熹的教育思想

第一章 传 略.....	(1)
第二章 朱熹的本性论.....	(10)
第三章 朱熹的教育目标论——“复性”说.....	(19)
第四章 朱熹的道德教育论——“居敬”说.....	(27)
第五章 朱熹的理智教育论——“穷理”说.....	(36)
第六章 朱熹的学习方法论.....	(45)
第七章 朱熹论小学、贡举与读书法.....	(53)
第八章 朱熹的教育思想之批判.....	(67)

陆九渊的教育思想

第一章 传 略.....	(76)
第二章 陆九渊的哲学和社会思想.....	(84)
第三章 陆九渊的教育目标论.....	(122)
第四章 陆九渊的教育内容论.....	(152)
第五章 陆九渊的学习方法论.....	(184)
第六章 陆九渊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之批判.....	(252)

杨简的哲学和教育思想

第一章 传 略.....	(272)
第二章 杨简的哲学思想.....	(281)

第三章	杨简的心性论和社会思想(295)
第四章	杨简论教育的意义和目标(313)
第五章	杨简论教育的内容(339)
第六章	杨简论读书(356)
第七章	杨简论读书(续)(392)
第八章	杨简论学习的方法(428)
第九章	杨简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之批判(462)

朱熹的教育思想

第一章 传 略

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思想史上，朱熹（1130—1200）占一极重要的地位。

其弟子黄榦以朱熹上比孟子。他写道：“窃问道之正统得人而后传。自周以来，任传道之责，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，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后，曾子、子思继其微，至孟子而始著。由孟子而后，周、程、张子继其绝，至先生而始著。”^①

蔡元培则以朱熹上比孔子。他写道：“宋之有晦庵，犹周之有孔子，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。孔子以前，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，至孔子而始演述为学说。孔子以后，道德之学说虽亦折中于孔子，而尚在乍离乍合之间，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见之孔教，整齐而釐订之，使有一定之范围。”^②

日人三浦藤作则以朱熹比拟康德。他写道：“中国太古以来所传之思想，朱子尽网罗而融合调和之，以建设自己学说，极似欧洲近世代表的哲学家康德。中国思想包容于其学说中，其显著者在古代为孔子之仁，子思之诚，孟子之仁义；在近世为周子之太极图说，程伊川之理气二元论及居敬

①王懋竑纂订《朱子年谱》第4卷，第60—61页所录。

②《中国伦理学史》第3卷，第39—40页。

穷理说，张横渠之心性说，邵康节之先天学等。盖此等学说乃由朱子组织一大体系也。朱子不仅研究儒书，且研究佛老之书，因发挥儒教精神之必要上，以佛老书中之术语，自由活用之；而儒教之学说，乃至朱子一改其面目。总之，朱子乃中国思想之集大成者，儒教哲学之建设者，已为留名于世界思想史上之一大伟人也。”①

简言之，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其实，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
自南宋到清季，七百余年间，朱熹编著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被用作国定教本，其所著的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礼记经传通解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楚词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等，以及其《语类》、《文集》等都是其流行最广的经典著作。朱熹在自南宋到清季七百余年的教育实践上的影响是异常伟大的。

朱熹所处的时代，是南宋国势消弱、军政腐化、剥削加深的时代。

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在抗战名将岳飞等对金用兵节节胜利时，南宋王朝在卖国贼秦桧的主持下和金人侵略者签订了投降的和议。根据这个和议，宋高宗要向金奉表称臣，每年贡绢银，淮水以北地方割让予金。朱熹的父亲朱松因不赞成秦桧主持的卖国和议，愤而辞职回家。其后朱熹屡上奏章，力陈雪耻复仇的方策并曾毁秦桧祠以贬黜国贼，其爱国精神昭然若揭。

自屈辱和议订立后，南宋政治腐化日甚。皇帝官吏都过

①三浦廉作著，张宗元、林科汇译：《中国伦理学史》第249—350页。

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宋高宗在临安大造宫殿，仅花园就多至四十余所。当时手工艺颇发达，南宋王朝为了与民争利，设立许多制造金银器与奢侈品的作坊并建立官营的酒楼和妓院。大小官吏不仅贿赂公行，而且兼营商业，甚至不惜和金人做走私贸易。与这种腐化风气相反，朱熹居官清廉，勤政爱民，屡上奏章，揭发政治腐化情形。

随着政治的腐化，军队亦堕落下去了。南宋王朝喜用庸懦贪污人做将帅。即便名将如张俊等亦剋扣军饷，穷奢极欲，从来不训练兵士，或使为工匠，或使为商贾，或使为奴隶，所以偶遇敌军，即不战自溃。当时朱熹曾屡上封事，痛陈将帅私吞军饷的罪状。

南宋王朝对农民和一般市民的剥削政策更变本加厉了。自行“经界法”以后，田赋不均情况虽略有改变，但自耕农所受剥削加深，多沦为佃户。南宋农田水利虽颇发达，但受益者仅限于地主。水旱灾情仍甚严重。当时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其最著者有“总制钱”、“月桩钱”和“版帐钱”等。文武官吏常开设“长生店”或当铺，以高利贷盘剥市民。朱熹服官时曾厉行“经界法”，兴修水利，创立社仓，以赈灾民；取消苛捐杂税，以纾民困，并曾屡上奏章，力陈总制钱的弊害。

以上是朱熹生活的七十年间的国势削弱、军政腐化、剥削加深的梗概与朱熹对于这些情形的基本态度。

朱熹出生于地主官僚家中，其父朱松徽州婺源人，擢进士第，曾任南剑尤溪县县尉，去官后，侨居该县。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朱熹生于尤溪寓舍。

朱熹自幼颖悟庄重。四岁，其父指天示之说：“天也”。他问说：“天之上何物？”其父异之。八岁，读孝经，题其

上说：“不若是，非人也。”尝从群儿戏沙上，独端坐以指画沙，视之乃八卦图。其颖悟庄重类此。

十一岁受业于家中。其父原任吏部员外郎，因反对秦桧主持的卖国和议，愤而辞职，回建阳寓舍，课子读书。其父曾与李侗共受业于罗从彦，罗从彦则师事程灏和程颐的高足杨时，所以朱熹所受的庭训，以二程的道学传统为其主要内容。十四岁其父卒，受遗命从学于刘子翬、刘勉之、胡宪。十八岁举建州乡贡。十九岁登进士第。

二十四岁，任泉州同安县主簿，便道谒李侗论学。到任后，选邑秀民充弟子员，访术名士以为表率，建经史阁，定释奠礼，抑豪右，恤贫民、禁妇女为僧道。二十九岁，以养亲请祠，差监潭州南岳庙。

三十岁，始受学于李侗，专致力于程门道学。李侗称其“人极颖悟，力行可畏。”

三十三岁，仍差监南岳庙。孝宗即位，应诏上封事，力陈富国强兵、雪耻复仇的必要。他写道：“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则不可和也明矣。愿断以义理之公，闭关绝约，任贤使能，立纪纲，厉风俗，数年之后，国富兵强，视吾力之强弱，观彼衅之浅深，徐起而图之。”^①在奏事垂拱殿时，他又写道：“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，今日所当为者，非战无以复仇，非守无以制胜。”^②除武学博士，寻复差监南岳庙。

四十岁，拈出程颐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在致知”二语，作为其讲学宗旨；其教育思想体系之轮廓自是已大抵确

①《宋史·本传》中华书局版，第429卷，第1页所引。

②同上书，同卷，第2页所引。

定。

四十二岁，创立社仓于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。先是朱熹请留民所偿官粟贮里中，愿贷者出息什二，岁小饥则弛半息，大祲则尽蠲之，人以为便。至是，建仓三亭以储官粟，门墙守舍皆具。其后依前敍散，更不收息，每石只收耗米三斤。于是该乡四五十里间，虽遇凶年，人不缺食。淳熙八年（1181）诏颁发其社仓法于诸郡，后世沿用此法，直至清季。

四十三岁，完成《论孟精义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西铭解义》等书的写作。

四十四岁，完成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》、《程氏外书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古今家祭礼》等书的写作。任左宣教郎，掌管合州崇道观。

四十六岁，完成《近思录》的写作，与吕祖谦、陆九渊等会讲于信州鹅湖寺。

四十七岁差管武夷山冲祐观。

四十八岁完成《论语集注》、《论语或问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周易本义》等书的写作。

五十岁，除知南康军。至郡，兴利除害，讲求荒政，奏免“总制钱”。尝诣郡学，引进士子，与之讲论。访白鹿洞书院遗址。奏复其学，立学规，揭示治学宗旨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，然后推以及人；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；为学之序为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笃行之；修身之要为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；处世之要为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；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。

五十一岁，应诏上封事，揭露当时军政腐化情形。关于军队腐化情形，他写道：“今日将帅之选，率皆膏梁子弟，厮役凡流，所得差遣，为费已甚不赀；到军之日，唯望裒敛刻剥，以偿债负，总餉饷之任者亦皆倚负幽阴，交通货赂，其所驱摧东南数十州之脂膏骨髓，名为供军，而辇载以输权幸之门者，不可以数计。”^①

在揭露当时政治腐化情形时，他续写道：“今宰相、台省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目皆失其职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。此一二小人者……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，各入其门，所喜则阴为引援，擢置清顯，所恶则密行訾毀，公肆挤排；交通货赂，则所盜者皆陛下之财；命卿置相，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……势成威立，中外靡然向之。”^②

五十二岁，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，寻改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到任，日与僚属钩访民隐，大修荒政，戢盗捕蝗，兴水利，减杂税，尝单车出巡，所历虽广，而人不知。毁秦桧祠。他在移文中写道：“窃见故相秦桧，归自金庭，久专国柄，内忍事仇之耻，外张震主之威，以恣睢戮善良，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；以喜怒为进退，崇奖天下谄谀偷惰之风。究其设心，何止误国？……永嘉号礼义之地，学校实风化之源，尚使有祠，无乃未讲？”^③其痛恨卖国贼秦桧之情溢于言表。

五十四岁，差管台州崇道观，辨浙学之非。

①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第1册，《年谱事实行状》第5页所引。

②同上书，《行状》第5—6页。

③《朱子年谱》第3卷，第7页所引。

五十六岁，差管华州云台观。辨陆学之非。

五十七岁，完成《易学启蒙》的写作。

五十八岁，完成《小学》的写作。差管南京鸿庆宫，除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辞未就任。

五十九岁，奏事延和殿，他在其第三奏劄中论“总制钱”的弊害时，写道：“经总制钱盖前代之所无，而祖宗盛时亦未之有。特起于宣和末年，仓促用兵，权宜措画。……渡江以后，虽知其弊，然费出愈繁，遂不能罢，复有增加，以至于今乃为大农之经赋。……岁月愈深，逋负日积，大郡所欠十数万缗，小郡亦不下一二万数。官吏操切，日益严峻，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。臣愚不知州县煎熬局促，果何日而少舒，斯民之叹息愁怨，果何时而少息也。”^①其痛恨剥削政策于此可见一斑。

又上封事，论辅翼太子，选任大臣，振举纲维，变化风俗，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等。他在揭露当时将帅贪污和士兵困苦情形时写道：“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，本非得已，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，甚者采薪织屨，掇拾糞壤以度朝夕，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，倚市门以求食也。怨詈傍讟，悖逆绝理，至有不可问者。一有缓急，不知陛下何所倚仗？是皆为将帅者巧为名色头会，箕敛阴夺，取其粮赐，以自封殖，而行货赂于近习，以图进用。”^②

他在抨击当时剥削政策时，续写道：“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，督趣日峻，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，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。以为未足，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

① 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第3册，《封事奏札·奏札卷上》第42页。

② 同上书，同册，《封事卷下》第5—6页。

胁之，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，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。于是中外承风，竞为苛急，监司明谕州郡，一守明谕属邑，不必留心民事，惟务催督财赋。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，而税外无名之赋，如和买、折帛、科罚、月桩之属，尚未论也。”^①

六十岁，《序大学章句》，《中庸章句》。

六十一岁，知漳州。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，减轻“总制钱”四百万。以习俗未知礼，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示之，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。土俗崇信释氏，男女娶僧庐为传经会，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，都禁之，并劝谕女道还俗。其后沈继祖奏劾朱熹“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”的罪状，其实朱熹只是实行其劝女道还俗的主张而已。

实行经界法以平均田税与抑制豪右。教诸军习射。朱熹初到漳州任时，无一人能射，后分诸军为三番，每日轮番入教场习射，两月之后，都能及等。刊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四经及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四书于郡。

六十二岁，除秘书阁修撰掌管南京鸿庆宫，归建阳。

六十三岁，完成《孟子要略》的写作。

六十五岁，知潭州。时洞獠侵扰属郡，遣使谕降之。先是瑶人蒲来矢起义，朱熹遣军校田升往谕以祸福，蒲来矢喜，偕其妻子来归，朱熹给以衣冠，使其回洞安居。

修复岳麓书院。朱熹于日间治郡事，甚劳，夜则与诸生讲论，随问而答。略无倦色，多训以切己务实，毋厌卑近，而慕高远，恳恻至到，闻者感动。

^①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第3册，《封事 奏札·奏札卷上》第14页。

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，受诏进讲《大学》。侍讲时，因屡次直言国事，忤韩侂胄意，仅四十六日罢免。

六十七岁，道学党祸起。自朱熹罢归后，韩侂胄一派人如胡纮、刘德秀、沈继祖、余嘉等，乘机攻讦，诋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为伪学，与朱熹相结纳的缙绅士子为逆党，并奏准以逆党中五十九人姓名布告全国，严禁讲学。于是从游之士，特立不顾者，屏伏丘壑，伊阿巽懦者，更名他师，过门不入，甚至变易衣冠，狎游市肆，以自别其非党。但朱熹仍日与诸生讲学不辍，并写成《仪礼经传通解》一书。

六十八岁，完成《韩文考异》的写作。

六十九岁，集书传，并口授蔡沈，使注书经。

七十岁，完成《楚词集注后语辨证》的写作。

七十一岁，病歿于建阳寓舍。初病，修书不辍，为诸生讲论，多至夜分。病已甚，勉起坐，改《大学》诚意章。疾革，手书属其子朱在及门人黄幹，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，易箦时端坐整衣冠，就枕而逝。

至于朱熹的日常生活，黄幹在为其师所作的《行状》中写道：“其闲居也，未明而起，深衣，幅巾，方履，拜于家庙以及先圣。退坐书室，几案必正，书籍器用必整。其饮食也，羹食行列有定位，匕箸举措有定所。倦而休也，瞑目端坐。休而起也，整步徐行。中夜而寝，既寝而寤，则拥衾而坐，或至达旦。威仪容止之则，自少至老，祁寒盛暑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有须臾之离也。”^①

关于其家庭生活，黄幹写道：“行于家者，奉亲极其孝，抚养极其慈，闺庭之间，内外斲斲，恩义之笃，怡怡如

① 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第1册，年谱事实《行状》第24页。

也。”^①

关于其政治生活，黄幹写道：“先生平居惓惓，无一念不在于国，闻时政之阙失，则戚然有不豫之色，语及国势之未振，则感慨以至泣下。然谨难进之礼，则一官之拜，必抗章而力辞；厉易退之节，则一语不合，必奉身而亟去。其事君也，不贬道以求售；其爱民也，不徇俗以苟安。故其与世，动辄龃龉，自筮仕以至属纩，五十年间，历事四朝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，道立难行也如此。”^②

关于其教学态度，黄幹写道：“从游之士，迭诵所习，以质其疑。意有未喻，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。问有未切，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。务学笃，则喜见于言。进道难，则忧形于色。讲论经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虽疾病支离，至诸生问辨，则脱然沉疴之去体。一日不讲学，则惕然以为忧。”^③

朱熹确是一个恤民爱国的政治家，笃实践履的道学家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。但其思想和行为则直接间接有利于封建王朝的剥削统治。

第二章 朱熹的本性论

朱熹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是其本性论，其本性论又渊源于其宇宙观。所以在陈述其本性论时，应首先讨论其宇宙观或本体论。

一、唯心的宇宙观

①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第1册，年谱事实《行状》第24页。

②同上书，同册，《行状》第22页。

③同上书，同册，《行状》第26页。

朱熹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。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精神，他称之为‘太极’或‘理’或‘形而上之道’。宇宙的现象是物质，他称之为‘阴阳五行’或‘气’或‘形而下之器’。他说：“太极只是一个理字。”^①换言之，太极即是理。即是宇宙的理性，是天地万物所赖以存在的最高的原理。他又说：“太极是理，形而上者；阴阳是气，形而下者。”^②换言之，太极是高高在上的控制一切的原理。他又说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物之理也；形而下者谓之器，物之物也。”^③换言之，事物原理便是道，事物的形体便是器，道支配着器。朱熹所谓太极、理、形而上之道，都是精神或本体，他所谓阴阳五行、气、形而下之器，都是物质或现象。精神或本体是更高的存在，而物质或现象是更低的存在。

但精神和物质，太极和阴阳，理和气，道和器是不可分离的。他说：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。”^④又说：“理未尝离气。”^⑤又说：“理又非别为一物，即存于是气之中。无是气，则是理亦无挂搭处。”^⑥依他的看法。理和气是不可分的，理是气的本体，气是理的体现。同一条道理，精神和物质，太极和阴阳，道和器亦是不可分离的。

精神和物质，理和气，虽是不可分离的，但精神或理是第一性的，原始的，而物质或气是第二性的，派生的。他

①《朱子语类》传经堂版，第1卷，第1页。

②同上书，第5卷，第3页。

③《续近思录》第1卷，第24页。

④《朱子语类》第1卷，第1页。

⑤同上书，同卷，第4页。

⑥同上引。